

# 家庭功能对农村留守儿童情绪健康的影响效应

向伟<sup>1,2</sup>, 肖汉仕<sup>1</sup>

(1.湖南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 2.长沙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03)

**摘要:** 基于湖南湘潭市 545 名农村留守儿童的调查数据, 就家庭功能对农村留守儿童情绪健康的相关性、影响效应以及社会自我效能感、情绪调节能力的链式中介效应进行实证分析, 结果表明: 家庭功能、社会自我效能感、情绪调节能力和情绪健康之间均具有正相关性; 家庭功能对其情绪健康有显著正向影响效用。社会自我效能感在家庭功能与其情绪健康之间的中介作用显著, 间接效应值为 0.16; 家庭功能通过“社会自我效能感→情绪调节能力”的链式中介作用于留守儿童的情绪健康, 间接效应值为 0.13。

**关键词:** 农村留守儿童; 情绪健康; 家庭功能; 社会自我效能感; 情绪调节能力

中图分类号: C912.8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18)06-0043-06

## Influence effect of family function on emotional health of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XIANG Wei<sup>1,2</sup>, XIAO Hanshi<sup>1</sup>

(1.College of Public Management,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2.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hangsha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03,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545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in Xiangtan city, Hunan province, this paper mak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correlation, influence and chain mediation effect of family function on the emotional health of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family function, social self-efficacy, emotional regulation ability and emotional health. Family functio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emotional health. Social self-efficacy plays a significant mediating role between family function and emotional health, with an indirect effect value of 0.16. Family function acts on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s emotional health through the chain mediation of "social self-efficacy → emotional regulation ability", with an indirect effect value of 0.13.

**Keywords:**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emotional health; family function; social self-efficacy; emotional regulation ability

随着工业化快速推进, 农村劳动力大规模流动到城镇, 形成了大量农村留守儿童。据统计, 2015年中国农村留守儿童总数达4 051万<sup>[1]</sup>。留守儿童是指因父母双方或一方流动到外地, 无法和父母共同生活的18岁以下儿童。大量研究表明, 在留守儿童成长过程中, 父母角色的缺位会对其心理健康带来不良影响。范兴华等的调查研究显示: 与非留守儿童相比, 留守儿童有更高的孤独感, 更低的幸福感; 无论是单留守儿童还是双留守儿童, 均表现出较多的抑郁情绪, 且双留守儿

童的抑郁水平会随着时间推移显著增加<sup>[2,3]</sup>。

梳理既有文献发现, 众多关于留守儿童情绪的研究主要是基于传统心理健康模型, 将情绪和心理状态划分为积极和消极两种, 且将两种状态视为“非此即彼”的关系。积极心理学则认为, 心理健康不应该只是没有心理疾病或者高水平的主观幸福感, 而应该是一种综合了两种状况的完全状态。虽然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是彼此相对独立的两个变量, 但消极情绪的减少并不意味着积极情绪的增加, 同时也不能简单认为消极情绪越少, 情绪就越健康<sup>[4]</sup>。已有研究显示, 留守儿童在抑郁、孤独感等消极情绪上的得分显著高于非留守儿童<sup>[3,5]</sup>, 但生活满意度却与非留守儿童无显著性差异<sup>[6]</sup>。鉴于父母较长时间外出直接影响孩子成长的家庭环境, 而家庭环境的优劣又主要通过家

收稿日期: 2018-09-20

基金项目: 湖南省社科规划办项目(14YBA290)

作者简介: 向伟(1987—), 男, 湖北咸宁人, 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心理健康教育。

庭功能的发挥加以衡量,因此,笔者拟应用积极心理学理论,并基于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双变量平衡视角及湖南湘潭市的调查数据,探讨家庭功能对农村留守儿童情绪健康的影响,以及社会自我效能感和情绪调节能力在其中的链式中介效应,以期对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的预防和干预提供参考。

## 一、理论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设

本研究主要应用“个人-环境交互作用”理论框架分析家庭功能对农村留守儿童情绪健康的作用机制。Magnusson和Stattin的“个人-环境交互作用理论”认为,个体心理发展是环境和个体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sup>[7]</sup>。

农村留守儿童存在较多的情绪问题,与其成长环境不无关系。Olson认为,家庭功能就是家庭的情感联系、家庭规则、家庭沟通以及应对外部事件的有效性;在亲密度和适应性上得分高的家庭,说明其家庭功能良好,反之则表示其家庭功能是不良的<sup>[8]</sup>。父母角色缺位进而导致家庭功能受损、农村留守儿童个体成长环境质量下降是影响儿童情绪健康最直接的诱因。对于农村留守儿童家庭而言,尽管父母外出务工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家庭经济压力,但家庭情感功能日益弱化是不争的事实。农村留守儿童与父母一方或双方常年分离,亲密的依恋关系难以建立,而父母的电话传情、祖辈的隔代亲情或亲友的关照之情均无法替代朝夕相处的父母亲情<sup>[9]</sup>,留守儿童的家庭功能普遍不如非留守儿童的家庭<sup>[10]</sup>。另外,个体社会适应能力与其家庭功能的状况密切相关。有研究显示,亲密度匮乏、家庭角色混乱和无稳定规则的家庭更容易导致其出现抑郁、焦虑等消极情绪<sup>[11,12]</sup>,因此,家庭功能是影响农村留守儿童情绪健康的重要因素。

尽管家庭功能对个体情绪发展极为重要,但作为微观环境的家庭对个体发展产生影响必然要经过“近端过程”的中介作用<sup>[13]</sup>。有研究表明:父母缺位的家庭环境不利于形成良好的亲子情感交流氛围,难以建立优质的亲子依恋关系,从而导致留守儿童人际交往能力欠缺,情绪难以得到合理宣泄<sup>[14]</sup>。由此可见,反映个体社交判断水平

的社会自我效能感以及情绪调节能力是两个重要的近端因素。

社会自我效能感是指个体对自己完成社交任务,且在社会互动中建立和维持人际关系能力的自信心和信念<sup>[15]</sup>。既有研究表明,家庭环境是影响社会自我效能感的重要因素,亲子之间的依恋以及父母的教育方式都能显著影响儿童个体的社会自我效能感<sup>[16,17]</sup>。父母缺位的家庭环境对个体社会自我效能感往往有着持久稳定的消极影响。调查显示,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对人际关系的效能感不容乐观,有18%的个体在人际关系中常常觉得自己受到冷落,“无感觉”的占到了54%,觉得自己“受欢迎的”仅有28%<sup>[18]</sup>。同时,社会自我效能感又能负向预测孤独、抑郁等负性情绪<sup>[19,20]</sup>,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sup>[21]</sup>。

情绪调节能力是个体以一种社会可以容忍的方式,灵活地对一系列积极或消极情绪作出反应的能力。Morris等认为家庭环境中的观察学习、教养方式和家庭情绪氛围不同程度地对儿童情绪调节能力产生影响,父母的敌对态度与儿童较低的情绪调节水平密切相关<sup>[22]</sup>。就农村留守儿童而言,家庭功能的强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亲子互动的数量和质量,因此父母的缺位可能直接影响留守儿童情绪调节能力的形成。有研究显示,留守儿童在自责、反思、灾难化等非适应性情绪调节策略上的得分明显高于非留守儿童,而在认知情绪调节和适应性认知情绪策略上的得分显著低于非留守儿童<sup>[23]</sup>。同时,情绪调节能力与情绪健康直接相关,能有效减弱正向或负向情绪反应<sup>[24]</sup>。此外,社会自我效能感反映了个体对自身社交能力的判断水平,与个体获取社会支持和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密切相关,而良好的社会支持对青少年的情绪调节能力又具有重要作用<sup>[25]</sup>。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就家庭功能、社会自我效能感、情绪调节能力对农村留守儿童情绪健康的影响提出以下假设:

H<sub>1</sub>: 家庭功能对农村留守儿童情绪健康有正向预测作用

H<sub>2</sub>: 社会自我效能感在家庭功能与农村留守儿童情绪健康间起中介作用

H<sub>3</sub>: 情绪调节能力在家庭功能与农村留守儿

童情绪健康间起中介作用

H<sub>4</sub>: 家庭功能通过社会自我效能感和情绪调节能力的链式中介实现其影响

## 二、变量测度与数据来源

### 1. 变量测度

本研究涉及的主要变量有情绪健康、家庭功能、社会自我效能感、情绪调节能力, 现将其测度方法分述如下:

(1) 情绪健康。情绪健康是在积极心理学研究框架下提出来的, 倡导研究者在考虑青少年的完全心理健康时, 需要同时关注个体的心理痛苦症状和积极心理品质<sup>[26]</sup>。本研究采用范肖冬等修订的情感量表, 包括正性情感和负性情感 2 个维度, 共 10 个项目, 要求用是非题的形式描述“过去几周”的情绪感受, 答“是”记 1 分, 答“否”记 0 分。正性情感用于测量个体的积极情绪体验, 如“因为别人对你的赞扬而感到骄傲”; 负性情感用于测量个体的消极情绪体验, 如“感到坐立不安”。该量表有较好的信效度<sup>[27]</sup>。由于情感平衡综合考虑了正负两种情绪体验, 能够全面反映个体的情绪状况, 故将其作为情绪健康的指标, 其量表 a 系数为 0.83。

(2) 家庭功能。采用费立鹏等修订的“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中文版)”测度家庭功能, 包括亲密度和适应性 2 个维度 30 个项目: 亲密度指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系, 包括 16 个项目; 适应性指随家庭发展变化每个成员所具有的适应能力, 包括 14 个项目。采用 5 点计分, 1 表示“不是”, 5 表示“总是”, 分数越高表示家庭功能越好。修订后的量表有良好的信效度。由于在中国家庭中, 家庭功能的发挥主要表现为亲密度和适应性两个方面<sup>[27]</sup>, 故将两个维度的总分作为家庭功能的指标, 其量表 a 系数为 0.89。

(3) 社会自我效能感。采用李雪梅编制的“中学生人际交往效能感问卷”进行测度<sup>[28]</sup>。包括信任感、自信心、情绪调节效能和主动性 4 个维度 16 个项目。信任感指对他人的信任度; 自信心指相信自己在他人心目中有着较积极的形象; 情绪调节效能指相信自己能够较好地表达和控制情绪; 主动性指能够主动与他人建立人际关系。

这 4 个维度比较完整地构成了个体对自己在人际关系中的交往效能感, 故将其总分作为衡量社会自我效能感的指标。问卷采取 5 点计分, 1 表示“完全不符合”, 5 表示“完全符合”, 分数越高表示社会自我效能感越高。问卷有良好的信效度, 其量表 a 系数为 0.71。

(4) 情绪调节能力。采用张新招编制的“留守儿童情绪调节能力量表”进行测度<sup>[29]</sup>。包括情绪体验、情绪认知和情绪控制能力 3 个维度 12 个项目。情绪体验能力指留守儿童对各种情绪状态的感受能力, 包括 5 个项目; 情绪认知能力指留守儿童对各种情绪状态的觉察和知觉能力, 包括 4 个项目; 情绪控制能力指留守儿童对自身情绪的调控能力, 包括 3 个项目。该量表专门针对留守儿童编制而成, 较全面地反映了留守儿童的情绪调节能力, 故采用其总分作为衡量留守儿童情绪调节能力的指标。量表使用 5 点计分, 1 表示“完全不符合”, 5 表示“完全符合”, 总分越高表示个体情绪调节能力越强。量表有良好的信效度, 其量表 a 系数为 0.74。

### 2.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自笔者所在课题组于 2016 年 10 月在湘潭市 4 所中小学所作的调查。课题组成员均为心理学专业的研究生, 在调查之前进行了统一培训。留守儿童的采样标准为: 来自农村地区, 其父母有一方或者双方远离居住地外出务工, 且单次持续时间在 6 个月以上(期间不能和孩子相聚); 由父母单方或祖辈或他人监护; 非离异家庭儿童或孤儿。

通过整群抽样方法抽取 600 名留守儿童, 剔除漏答、乱答等无效问卷 55 份, 共收回有效问卷 545 份。其中男生 279 人、女生 266 人, 初一 139 人、初二 40 人、初三 78 人、高一 140 人、高二 119 人、高三 29 人。年龄范围为 11~17 岁, 平均年龄  $14.34 \pm 1.61$ 。

## 三、实证研究结果及其分析

(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为了减少自陈式问卷法带来的共同方法偏差, 本研究在数据收集过程中通过强调匿名、保密等进行程序控制, 并运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法验证其程序控制效果,

再将各个变量放在一起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有16个,且第一个因子的解释率为17.05%,小于40%,说明研究的共同方法偏差程度在可接受范围之内。

(2) 变量间的相关分析。对家庭功能、社会自我效能感、情绪调节能力和情绪健康进行 Pearson 相关分析的结果表明(表1):情绪健康与家庭功能、社会自我效能感、情绪调节能力均显著正相关;家庭功能与社会自我效能感、情绪调节能力均显著正相关;社会自我效能感与情绪调节能力显著正相关。

表1 各变量的相关性

变量	M	SD	家庭功能	社会自我效能感	情绪调节能力
家庭功能	3.06	0.61	1		
社会自我效能感	3.27	0.49	0.30**	1	
情绪调节能力	3.48	0.52	0.23**	0.60**	1
情绪健康	5.62	1.73	0.22**	0.37**	0.40**

注:\*\*表示  $p < 0.01$

表2 基于链式中介模型的实证分析结果

回归方程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整体拟合指数				回归系数显著性		
			R	R <sup>2</sup>	F	p	$\beta$	t	P
	社会自我效能感	家庭功能	0.30	0.09	54.85	<0.001	0.24	7.41	<0.001
	情绪调节能力	社会自我效能感	0.39	0.16	91.59	<0.001	0.62	16.07	<0.001
		家庭功能					0.04	1.42	0.100
	情绪健康	社会自我效能感	0.26	0.07	23.44	<0.001	0.65	3.30	<0.01
		情绪调节					0.89	4.83	<0.001
		家庭功能					0.28	2.36	0.020

在链式中介模型检验的基础上,再应用 Hayes 开发的 PROCESS PROCEDURE for SPSS 软件对社会自我效能感和情绪调节能力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其结果(表3)显示,两者的总间接效应(0.32, 占总效应的 53.82%)的 Bootstrap95%置信区间不包含0,由此说明两者在家庭功能与留守儿童情绪健康之间具有显著中介效应。由于“家庭功能→情绪调节能力→情绪健康”(间接效应3的路径)构成的间接效应的置信区间包含0,即间接效应不显著,故其中介效应由两个间接效应组成:其一,“家庭功能→社会自我效能感→情绪健康”(间接效应1的路径)的间接效应为0.16,占总间接效应的 26.91%;其二,“家庭功能→社会自我效能感→情绪调节能力→情绪健康”(间接效应2

(3) 链式中介模型的检验与分析。链式中介模型不仅可以分析自变量通过每个中介变量的独立中介效用对因变量的影响,而且可以分析自变量依次通过各个中介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sup>[30]</sup>。本研究中的家庭功能不仅通过社会自我效能感、情绪调节能力等中介独立作用于情绪健康,而且通过依次影响社会自我效能感、情绪调节能力作用于情绪健康,其具体有以下路径:家庭功能→情绪健康;家庭功能→社会自我效能感→情绪健康;家庭功能→情绪调节能力→情绪健康;家庭功能→社会自我效能感→情绪调节能力→情绪健康。因此,选择链式中介模型进行检验与分析,其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表2):家庭功能对农村留守儿童的社会自我效能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同时测度家庭功能和社会自我效能感对其情绪调节能力的影响效应时,家庭功能的作用不显著,而社会自我效能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当同时测度家庭功能、社会自我效能感和情绪调节能力对情绪健康的影响效应时,三者均有显著影响效用。

的路径)的间接效应为0.13, 占总间接效应的 21.86%。两者的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表明两条路径的间接效应都达到显著性水平。“家庭功能→情绪调节能力→留守儿童情绪健康”的路径不显著,即家庭功能不能直接通过影响留守儿童的情绪调节能力来影响其情绪健康。这可能与本研究主要侧重于家庭功能的亲密度和适应性有关。家庭亲密度指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关系,家庭适应性指家庭为了应付外在环境压力或婚姻、家庭的发展需要而改变其权利结构、角色分配或家庭规则的能力<sup>[31]</sup>。两者都强调家庭作为一种背景性环境的内涵,较少涉及家庭互动的内容,而儿童情绪调节能力的形成更多是在与父母的沟通中(如情感和信息交流方式)形成的<sup>[32]</sup>。

表 3 社会自我效能感和情绪调节能力的中介效应分析

	间接 效应值	Boot 标准误	Boot CI 下限	Boot CI 上限	相对中介 效应/%
总间接效应	0.32	0.07	0.21	0.46	53.82
间接效应 1	0.16	0.05	0.07	0.27	26.91
间接效应 2	0.13	0.05	0.09	0.27	21.86
间接效应 3	0.03	0.07	-0.17	0.11	5.05

注：Boot 标准误、Boot CI 下限和 Boot CI 上限分别指通过偏差校正的百分位 Bootstrap 法估计的间接效应的标准误、95%置信区间的下限和上限。

#### 四、研究结论及其启示

基于上述研究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家庭功能对农村留守儿童情绪健康具有直接显著影响效应，以社会自我效能感为中介的路径和以“社会自我效能感→情绪调节能力”为中介的链式中介路径的间接效应比较显著；家庭功能越好，对于增进留守儿童的社会自我效能感、情绪调节能力和情绪健康的效果也就越好。这与既有研究结果也基本一致<sup>[16,22,33]</sup>。本研究结果也表明：就留守儿童的情绪健康而言，在其留守现状难以改变的情况下，有针对性地创新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服务，提升其社会自我效能感和情绪调节能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因父母角色缺位导致的家庭功能不足对其情绪健康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其具体启示有以下三方面。

(1) 充分发挥家庭功能，应将改善家庭微环境作为促进农村留守儿童情绪健康发展的重要方向。家庭功能包括家庭成员间的情感联系程度、家庭规则的制定和遵守、家庭沟通的数量和质量、及时有效应对外部事件等基本要素<sup>[34]</sup>。它们为家庭成员生理、心理、社会性等方面的健康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环境条件，是影响个体健康成长最重要的微观环境。因此，在父母外出务工的过程中，应尽可能找到发挥家庭功能的替代方案。首先，在外务工的父母仍然是发挥家庭功能最重要的因素。在现代如此便利的通讯条件下，父母即使不在家，也完全可以与孩子频繁沟通和联系，时时关注孩子的学习和生活，认真倾听其心声，及时满足其合理诉求，让孩子时时感受到父母的关爱。其次，注重开发乡土性的社会支持系统，充分利用亲属、邻里的网络资源，以补充家庭功能的缺失。在农村，亲属和邻居往往能够为

孩子提供非常及时和实际的帮助，甚至提供必要的情感支持，以部分弥补父母缺失导致的家庭功能缺失。

(2) 基于家庭功能对农村留守儿童情绪健康的作用机制，即家庭功能除了直接作用于留守儿童的情绪健康外，还可以通过社会自我效能感对其情绪健康产生间接作用，因此应注重儿童社会自我效能感的提升。社会自我效能感最初是在家庭环境中与他人的互动中逐渐形成的，家庭成员间关系越亲密、信息交流越通畅，儿童适应外部压力和改变自身角色的能力就越强，从社交关系中获得的好感就越多，对自我价值也更容易产生积极的判断和信念。因此，针对父母缺位的农村留守儿童，在成长过程中要创造条件尽可能地让其感受到父母和其他家庭成员的赞许与期待，特别是对留守儿童内在品质与能力的认同。应鼓励留守儿童积极勇敢地走出去，如父母可以引导孩子在与亲友、同学等人际交往过程中消除顾虑，不要害怕被拒绝而变得退缩不前。其所在学校、社区等也应关爱农村留守儿童，通过各种方式帮助其与他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以形成良好的社会自我效能感。

(3) 情绪调节能力在家庭功能与留守儿童的情绪健康之间有链式中介效应，要注重提高农村留守儿童的情绪调节能力。农村留守儿童在对待父母打工的态度、父母回家的频率、亲子联系频率上直接影响着他们的情绪调节能力，既往研究表明，通过设计系列团体辅导活动，可以显著提升参与者的情绪调节能力<sup>[35-37]</sup>。因此，在家庭成长环境中，父母要通过改善亲子沟通方式、增加亲子沟通频率和提升亲子沟通质量来提高留守儿童的情绪调节能力；在学校教育情境中，班主任或任课教师可以借助团体心理辅导、成长沙龙、角色扮演、个体咨询等途径来穿插情绪教学内容，通过认知能力的培养来提高留守儿童的情绪调节能力。

#### 参考文献：

- [1] 段成荣, 赖妙华, 秦敏. 21 世纪以来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变动趋势研究[J]. 中国青年研究, 2017(6): 52-60.
- [2] 范兴华, 余思, 彭佳, 等. 留守儿童生活压力与孤独感、幸福感的关系: 心理资本的中介与调节作用[J]. 心理科学, 2017, 40(2): 388-394.

- [3] 范兴华, 方晓义, 黄月胜, 等. 父母关爱对农村留守儿童抑郁的影响机制: 追踪研究[J]. 心理学报, 2018, 50(9): 1029-1040.
- [4] Larsen JT, Mcgraw AP, Cacioppo JT. Can people feel happy and sad at the same time?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2001, 81(4): 684-696.
- [5] Cheng J, Sun YH. Depression and anxiety among left-behind children in China: A systematic review [J]. Child: Care, Health & Development, 2015, 41(4): 515-523.
- [6] Wen M, Lin D. Child development in rural China: Children left behind by their migrant parents and children of non-migrant families [J]. Child Development, 2012, 83(1): 120-136.
- [7] Magnusson D, Stattin H. Person-context interaction theories[C]//Damon & R M, Lerner (Eds). 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y: Theoretical models of human development. New York: Wiley, 1998.
- [8] Olson D H. Circumplex Model of marital and family systems[J]. Journal of Family Therapy, 2000, 22(2): 144-167.
- [9] 吕吉, 刘亮. 农村留守儿童家庭结构与功能的变化及其影响[J]. 中国特殊教育, 2011, 10: 59-62.
- [10] 陈锋菊, 罗旭芳. 家庭功能对农村留守儿童问题行为的影响——兼论自尊的中介效应[J].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17(1): 67-70.
- [11] 胡传存, 张许来. 青少年情绪障碍患者心理健康状况及其与家庭功能的相关性研究[J]. 临床心身疾病杂志, 2013, 19(1): 67-69.
- [12] 徐洁, 方晓义, 张锦涛, 等. 家庭功能对青少年情绪问题的作用机制[J].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08, 10(2): 79-85.
- [13] Bronfenbrenner U. Making Human Beings Human [M]. Thousand Oaks, CA: Sage, 2005.
- [14] 张玉琴. 农村留守幼儿社会发展现状研究[J]. 运城学院学报, 2018, 36(1): 77-81.
- [15] Smith H M, Betz N E. An examination of efficacy and esteem pathways to depression in young adulthood [J].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2002, 49(4): 438-448.
- [16] Coleman P K. Perceptions of parent-child attachment, social self-Efficacy, and peer relationships in middle childhood [J]. Infant and Child Development, 2003, 12: 351-368.
- [17] 倪芳. 内蒙古地区高校大学生父母教育方式、社会自我效能感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研究[D]. 呼和浩特: 内蒙古农业大学, 2013. 13.
- [18] 徐振轩. 社会支持理论视域下留守经历大学生人际关系探究[J]. 教育评论, 2018, 6: 93-97.
- [19] Erozkán A, Deniz S.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self-efficacy and learned resourcefulness on loneliness [J]. Online Journal of Counseling and Education, 2012, 1(2): 57-74.
- [20] Hermann K S, Betz N E. Path models of the relationships of instrumentality and expressiveness, social self-efficacy, and self-esteem to depressive symptoms in college students[J]. Journal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2006, 25(10): 1086-1106.
- [21] Fan J, Meng H, Zhao B, et al. Further validation of a U. S. adult social self-efficacy inventory in Chinese population [J]. Journal of Career assessment, 2012, 20(4): 463-478.
- [22] Morris A S, Silk J S, Steinberg L. The role of family context in the development of emotion regulation[J]. Social Development, 2007, 16(2): 361-388.
- [23] 康国贤. 农村留守初中生自尊与情绪调节的关系研究[D]. 郑州: 河南大学, 2013.
- [24] Kalokerinos E K, Greenaway K H, Denson T F. Reappraisal but not suppression down regulates the experience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emotion [J]. Emotion, 2015, 15(3): 271-275.
- [25] 邢怡伦, 王建平, 尉玮, 等. 社会支持对青少年焦虑的影响: 情绪调节策略的中介作用[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6, 24(6): 1079-1082.
- [26] Seligman ME, Ernst RM, Gillham J, et al. Positive education: Positive psychology and classroom interventions[J]. Ox-ford Review of Education, 2009, 35(3): 293-311.
- [27] 汪向东, 王希林, 马弘. 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增订版)[M].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 1999.
- [28] 李雪梅. 中学生人际交往效能感及其与人际压力、人际压力应对策略关系的研究[D]. 重庆: 西南大学, 2006.
- [29] 张新招. 福建长乐海外留守儿童的情绪调节能力发展状况研究[D]. 福州: 福建师范大学, 2008.
- [30] Taylor A B, Machinnon D P, Tein J Y. Test of the three-path mediated effect [J].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Methods, 2008, 11(2), 241-269.
- [31] Magnusson D, Stattin H. Person-context interaction theories[C]//Damon & R M. 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y: Theoretical models of human development. New York: Wiley, 1998.
- [32] 詹启生, 武艺. 留守经历大学生家庭教养方式对情绪调节策略的影响: 亲子沟通的中介作用[J]. 中国特殊教育, 2016, 10: 40-46.
- [33] 王玉龙, 汪瑶, 唐卓, 等. 家庭功能与青少年情绪健康的关系: 母子依恋的中介及性别差异[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7, 25(6): 1160-1163.
- [34] Olson D H. Circumplex model of marital and family systems[J]. Journal of Family Therapy, 2000, 22(2): 144-167.
- [35] 王国猛. 情绪自我教育与初中生情绪调节能力的实验研究[J].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 2003, 2(1): 83-90.
- [36] 于晓明. 提高情绪调节能力对中专新生攻击性影响的干预研究[D]. 昆明: 云南师范大学, 2011.
- [37] 李春芳. 中职生情绪调节能力的发展及其干预研究[D]. 石家庄: 河北师范大学, 2017.

责任编辑: 曾凡盛